

青 年 学 丛 书

青 春 史 赞

张舒勃 主编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青 春 史 赞

张舒勃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工程兵机械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5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065—1100—2/K·93

定 价：4.50元

社编号2—22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忧国求索寻新路	(1)
一、艰难国运与辛亥风云	(2)
二、古国沉沦与留日学生运动	(13)
三、黑暗统治与《新青年》的号角	(23)
四、改造中国的探索与新民学会对“主义” 的研讨	(33)
五、“新思潮”的传播与赴法勤工俭学	(41)
第二章 从先锋到桥梁	(50)
六、五四惊雷与觉醒的一代	(51)
七、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与一代新人 的成长	(59)
八、共青团的创建与奠基者的足迹	(64)
九、黄埔军校与革命先锋	(72)
十、五卅风暴与热血青年	(82)
第三章 到农村点燃燎原之火	(88)
十一、血洗宝山路与青天白日旗	(88)
十二、挫败中的奋起与求索路上的艰辛	(101)
十三、文化“围剿”与血沃中原	(111)
十四、长征铁流与红军性格	(121)

十五、华北事变与一二九道路·····	(130)
第四章 御侮同怀赤子心 ·····	(140)
十六、上海抗战与“八百壮士”·····	(140)
十七、共赴国难与中流砥柱·····	(149)
十八、日寇暴行与华侨报国·····	(160)
十九、“窑洞大学”与奔赴延安·····	(174)
二十、斯诺的“觉醒点”与八路军前线 的中国人·····	(183)
第五章 血奠五星旗 ·····	(194)
二十一、抗战胜利与民主抗争 的第一把火·····	(195)
二十二、《中美商约》与抗暴怒潮·····	(206)
二十三、水深火热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218)
二十四、进军凯歌与黎明前的战斗·····	(233)
二十五、“蒋家王朝”的覆灭与血的奠基·····	(246)
第六章 青春在共和国的旗帜下闪光 ·····	(259)
二十六、抗美援朝与志愿军英烈·····	(260)
二十七、会战大庆与荒原铁人·····	(271)
二十八、“雷锋精神”与竞争意识·····	(279)
二十九、江青一伙作乱与“四五”青年抗争·····	(289)
三十、通往宇宙之路与无名英雄的足迹·····	(300)
三十一、走向未来与青年一代·····	(310)
编者的话·····	(323)
后 记·····	(326)

第一章 忧国求索寻新路

1896年6月，13名中国青年离开故乡，东渡日本。由此开始，中国掀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出国留学热潮。

在此之前，虽曾有容闳等人的赴美留学、严复等人的赴欧留学，但都未形成持续的潮流。

究其原因，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彻底打碎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们的天朝大国梦，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中国的一切东西是优秀的。中国虽然被迫打开了大门，但很少有人想到门外看个究竟。

甲午战争的一记重击，惊醒了中国的精英们。近在咫尺，长期被中国人视为东夷小国的日本，竟然打得天朝上国丧师失地。严酷的现实，激起了较为普遍的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

于是，中国人、首先是年轻的一代，走向了世界，寻求拯救中华的途径。

从日本人那里，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看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富强。

于是，一代脱颖而出的青年人开始在中国播撒起资本主义的种子；他们向国人揭示中国的危机，革命的必要，资本主义的价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

了。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在共和制的招牌下，仍然是专制横行。资本主义的种子，刚刚长出点幼芽就枯萎了。

就在这时，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有的在辛亥风云中受过洗礼、当过偏将，更多的则是刚刚接受西学教育的青年学生。他们愤然于辛亥后仍旧黑暗的现实，决心依靠青年自己的力量完成辛亥未竟的大业。

这就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

觉醒了的青年们在继续求索，他们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西欧去。于是，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留学热潮，到西欧留学，寻求真理。

一、艰难国运与辛亥风云

1911年（农历辛亥年，辛亥革命即因此得名）10月10日夜，武昌紫阳湖畔新军第八镇第八营的一些士兵，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等的指挥下，冲出营房，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一夜之间，起义军就占领了武昌。11日夜和12日，又光复了汉阳和汉口。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党人早已撒下火种的南北各省，迅即响应。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50多天里，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等15个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形成一个全国性革命高潮。

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在南

京成立，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在这一沉重打击下，清朝皇帝被迫于2月12日退位。辛亥革命胜利了！从此，在中国延续了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彻底推翻，共和制度，出现在中华大地。

尽管辛亥革命的果实随后即为袁世凯所窃取，共和制度的真正贯彻，还需人们的斗争，但是，它毕竟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创之举，何其艰难！为了它，有多少革命志士呕心沥血、精心筹划；有多少革命志士破嗓裂喉乃至牺牲生命以唤醒民众；又有多少革命志士抛头洒血去冲锋陷阵，而青年，则是这些志士中的中坚。

宣传革命最有力的，是青年们。因为，他们极少旧思想的影响和束缚，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力争与时代同步，故而能在思想上、观念上率先变革，并成为引导大众的先鋒。

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就是这样一位用革命的号角惊醒神州睡狮的青年志士。他出生在四川巴县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聪颖好学，6岁进私塾，几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长辈们希望他在科举的道路上飞黄腾达，但此时维新运动已经开始，少年邹容接触到一些西方“新学”，因而对封建旧学极为反感。他曾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袁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1898年邹容来到重庆，在一所经学院学习，并随一位日本人学习英、日语。他大胆抨击封建旧学，“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章炳麟：《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因而被书院开除。邹容随即赴日本自费留学，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是这种勇于追求真理、追求新思想的特点，使他成为资产阶级革命

派中宣传革命最有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最多的一人。1903年，被迫从日本回国，不到18岁的邹容，写成了震若春雷的《革命军》。

《革命军》充溢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以流畅通俗的文笔，激越昂扬的词句，讲明了反清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理。邹容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革命的神圣和伟大。他写道：“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邹容还通过对清王朝二百多年来残酷压迫全国各族人民和媚外卖国的淋漓尽致的揭露，通过对清政府统治下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备受压迫剥削境况的详尽描述，论证革命之现实必然性，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最后，邹容将革命的目标取向确定为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正是由于《革命军》透彻的说理，沉痛而炽热的感情，使它成为当时革命志士的必读书目，使人们“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斫地、奋身入海之状”，也使清政府惊恐万状。他们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介绍《革命军》的《苏报》，逮捕了《苏报》主笔章太炎。邹容得知后，第二天就毅然决然地自动到巡捕房投案，表示要与章太炎同生共死，被租界会审公廨判刑2年（章被判3年）。在狱中，邹容因惨遭折磨，不幸于1905年4月3日病死，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陈天华，是宣传革命的另一位主将。这位生在农村、

家境贫寒的青年，少年时代靠自己提篮叫卖谋生，直到15岁时才得以进入私塾就读。这种艰难的境遇，使得他从小即养成一种反抗性格，“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同时，街头叫卖的生活，也使他极为熟悉群众语言，加上他的聪明、好学，特别喜爱弹唱小说，并“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为他后来写出具有民间风格和气派，老百姓喜听易懂，“动人听闻、便于唱口，”能够深入人脑的革命宣传品奠定了基础。

1903年初，陈天华由求实学堂资送日本留学。不久，拒俄运动兴起，他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在本部任办事员。年底，陈天华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以炽烈的爱国热情，民间弹唱的形式，向人们揭露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痛陈中华民族悲惨的前景：“枪林弹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呼吁全国人民“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留芳”。这悲愤、真切、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词句，随着它那易于诵唱的形式，传遍各地，“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这位杰出的宣传家，“革命党之大文豪”，不仅以自己的言论唤醒国人，而且最后以自己的牺牲去惊醒国人。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严禁中国留日学生参加爱国活动的“取缔规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八千

余名学生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但这种一时激愤之所为，很快冷了下来，学生内部出现分歧，留日学生总会领导人也不愿意负责领导这一抗议活动。陈天华对此非常沉痛，多年郁积的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不可遏制，决心牺牲自己惊醒同胞，“举行救国之实”，（陈天华《绝命辞》）并抗议日本报纸对留学生的诋毁。1905年12月8日，他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0岁，完成了他那悲壮激昂的爱国绝唱的最后一曲。

朱执信，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主要宣传家。这位与邹容生于同年（188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天资并不突出，且身体孱弱，但他踏实勤奋，不仅在法政、经济方面有较深造诣，而且擅长数学、医学，并通英、日、俄3种外语，使他具备了从事理论工作的良好基础。1905年同盟会成立，年仅20岁的朱执信被选任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从1905年到1908年，朱执信以其火一般的热情，卓越的理论才华，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和撰述工作，写下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为推翻清朝统治擂鼓呐喊。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心理的国家主义》等文中，朱执信抨击了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指明清王朝是内忧外患的祸根；揭露了清王朝假立宪的骗局，指出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强调革命是挽救时局的唯一办法，号召人们摒弃对清政府的幻想，举起反清的旗帜。

在当时同盟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只赞同以推翻满洲贵族统治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而对民权、民生主义持异议的情

况下，朱执信，这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年轻革命家，却以他卓越的理论见识和对革命的忠诚，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极大的同情，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他强调指出，革命是劳苦大众的事情，革命应该是国民的革命；而要使革命真正成为国民革命，就须使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进行，不仅要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使中等阶级掌握权利，而且必须注意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

如果说，青年志士们在对革命的热情宣传中表现出了敢为时代先锋的精神，那么，他们还以高度的献身精神在战场上、在各种实际工作中为革命而奋斗。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武装斗争是一大法宝。因为，无论是清朝统治者，还是后来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都把军队当作维护统治的最主要的工具，把镇压当作第一手段。因此，革命者也必须把武装斗争作为第一手段。但是，武装斗争，就意味着流血牺牲，意味着本可以继续存在的生命要在顷刻间消失。年轻的志士们，正处在美丽的年华，他们并非不懂得生命的宝贵，不知道战场的凶险，但为了壮丽的祖国解放事业，义无反顾，甘愿抛头洒血。

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发动过10次武装起义。每次起义，青年志士都是基本力量或骨干分子。

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为例，葬于黄花岗的72烈士，基本上都是青年（除十几位不知年龄者外，其余都在33岁以下），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官、商人等。这次起义，原本从南洋和国内各地抽调革命党人800多人组成了“先锋队”（敢死队），基本由青年组成，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后仓卒发难，参加起义的120余人，均为“选锋

队”员。这些青年志士，个个都抱定了为革命捐躯的决心。黄兴在起义前写的《致南洋同志书》中，激昂陈词：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方声洞在写给家人的绝笔书中说：“夫男儿存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在战斗中，他们个个勇猛异常。朱执信“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胸腿受伤，血透外衣”，仍坚持战斗。方声洞从督署冲出至双底门，“孤身被围，容无惧色，犹挥弹突出，计杀哨弁兵勇等二十余人。背血叉，身中枪，血流遍体而气不衰，弹尽力竭而死。”青年工人李文楷，“偕众人奋勇前进，与清军巷战至一小时之久，毙敌甚多。君身中数弹，犹奋力直前，血流如注，卒以伤重扑地而死”。

还有的青年志士，不仅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领导斗争，而且还在刑场上宣传革命，同敌人斗争。其英勇精神，感人至深。

革命烈士熊成基，17岁时即加入反清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后参加新军担任下级官佐，常向士兵讲解《民报》，宣传民族民权革命思想。1907年冬，他和另一位革命党人倪映典策划安庆起义，因事机泄露而未成，熊成基毫不气馁，更积极地进行活动。1908年11月19日，他又在安庆领导起义，但因城内接应不上，失败。随后，熊成基转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又于1909年9月回东北活动，为革命筹集经费。不幸被捕后，他大义凛然，直言革命宗旨是“推倒野蛮专制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滌我祖国历史上莫大之耻辱”，主张“种族革命开其先，尤必有政治革命继其后”。英勇就义前，他慷慨激昂地向周围

的群众说：“你们大家来看杀人，要知杀的是我熊成基。熊成基是一个革命党，不是杀人越货的红胡子。红胡子不怕死，是祸国殃民；我不怕死，是爱国救民。人谁不死，我死不足惜，我死只要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排满革命，必定成功。我纵流血，亦当含笑九泉”。

也有这样的青年志士，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善于发明创造。如果在建设时期，他们可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或实业家。但在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历史主题的情况下，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用自己特殊的才能为革命贡献着力量。黄花岗72烈士之一、被称为“炸弹大王”的喻培伦，就是这样一位青年。他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从小不喜欢私塾的经史之书，而乐于钻研机械技术，常偷偷把家里的机械自鸣钟拆开，研究一阵后又装好。1905年，19岁的喻培伦到日本留学。面对如此之多的新式学科和先进技术，他恨不能一下子全部学到手。他一次又一次转学，学习物理、化学、工业分析等，以便回国开办实业。1907年，喻培伦加入同盟会，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于革命事业。为了配合武装起义，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化学、物理和机械学知识，研制炸弹。经过反复试验，付出了被炸掉3个手指的代价后，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安全的配制炸药的方法，而且可以用电流、化学、钟表等各种方式引爆。他还把炸弹做成朝鲜麻糖的样子，并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喻培伦后来把这些经验写成《安全炸药制造法》，为各地革命党人提供了一套先进的炸弹制造方法。1911年春，同盟会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喻培伦应黄兴之召前往，专门负责制造供应炸弹。仅两天多时间，他就指导大家用简陋工具造出300多

枚。当起义将要发动时，大家考虑到他是革命队伍中难得的科技人才，要他留下来，他坚决不肯，反驳道：“我为革命才学制炸弹，现在做了炸弹，大家都去，我反倒不能去，那不行！”起义时随黄兴进攻督署，“身上负炸弹一大束，左手持号筒，右手拿手枪，额间尽染灰土，容貌威猛，好象要杀尽清吏才泄心头之恨似的。”（陆丹林《革命史谭》）后转攻督练公所，“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最后全身被创，被捕牺牲。

这些青年革命志士，不仅有须眉男儿，亦有巾帼女杰。著名革命家秋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闺秀，却极少封建小姐气息，更多的是不让须眉的救国大志和豪气。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秋瑾来到北京，目睹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秋瑾：《宝刀歌》诗句）的危局，秋瑾痛切地感到“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她决心冲破家庭的束缚，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1904年夏，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典质钗环，自筹旅费，“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秋瑾诗句）只身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她一面学习知识，一面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起组织了“共爱会”、“十人会”，创办了鼓吹推翻清王朝、提倡男女平权的《白话报》，后又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她回国参加国内斗争，临行前致书友人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荃、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

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表达了她不甘落后于须眉、要为妇女争光的决心。回国后，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同时，以她任督办的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联络会党，训练骨干，编组光复军，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7月6日，起义首先由徐锡麟领导在安庆仓卒发动，不幸失败。秋瑾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决心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民众。她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大通学堂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立即走避，自己则坚持不走。7月13日，清军包围了学堂，逮捕了秋瑾等6人，并于15日杀害。这位在人间度过了31个不平凡春秋的女杰，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表达了矢志“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秋瑾，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坚信革命胜利的信心。

还有这样一对姐妹，她们都曾经为辛亥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姐姐叫尹锐志，妹妹叫尹维峻。1905年，姐姐锐志因向光复会设在浙江嵊县的秘密机关报告了清廷企图破坏的消息，保住了机关，年仅14岁即被吸收入会。第二年，姐妹俩先后来到绍兴，进入秋瑾任教的明道女学堂读书，深受秋瑾革命思想的影响，1907年夏，光复会皖浙起义失败，清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锐志姐妹只好转赴上海。这时上海光复会总部亦因起义失败，陷于瘫痪。年轻的姐妹俩在衣食无着的恶劣条件下，一面在车站码头卖书卖报维持生计，一面联络失败的同志和革命志士。后来，她们不仅将光复会失散的同志联络到了一起，还与江浙湖广的许多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1908年夏，姐妹俩从上海来到绍兴，以办女学为掩护，协同会党首领王金发暗杀了杀

害秋瑾的谋主，为先烈报了仇。1910年，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光复会决定设立固定机关，由尹氏姐妹掌管机关事务，并以她俩名字取名为“锐峻学社”。尹锐志和尹维峻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广泛联络各校学生和新军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尹锐志便邀请原有联系的江南制造局的沪军陈汉钦、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等共商起义。三军早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极表赞同，立即加入光复会，组成光复军，第二天易帜，上海得以迅速光复。不久，杭州革命党人组织民军起义，上海光复军派张伯歧、尹维峻率1500人的敢死队前往支援。在夜袭浙江巡抚衙门的战斗中，尹维峻冲锋在前，第一个掷出炸弹，炸毁了巡抚署一角。杭州光复，15岁的尹维峻立了战功。随后，姐妹俩又率领光复军和女子荡宁队参加了攻克南京的战斗。如果说，光复会在江浙沪光复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那么，年轻的尹氏姐妹则是江浙沪光复的功臣。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幅写满了字的白布方巾。这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牺牲前写给妻子的绝笔书。这封感情真挚、文词悲壮、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与妻书，被誉为“革命党人至高尚纯洁的情书”，充分展示了革命者的情怀。书中写道：“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故遂忍悲为汝言之。”林觉民于是首先讲述了舍妻先死的道理：“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接

着，他回忆了当年的恩爱生活，再次讲述为革命而死的道理：“初婚三四个月，……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但今日之形势，不得不立志革命。”深厚的夫妻之情和深刻的革命之理，相互交融，表现出了年轻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二、古国沉沦与留日学生运动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身处异国，西望故园，风雨如磐的祖国和苦难呻吟的同胞，激起他满腔炎黄热血，写下了这首铭志的七言绝句。这沉重的情调，悲壮的精神，表达了鲁迅和当时大部分留日青年的心声。

神州古国，已到了国亡种灭的危急关头。甲午一战，偌大的中国败给了东洋小国日本，一纸《马关条约》，把已经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半殖民地枷锁，牢牢地固定下来。资本主义的后起小国日本在中国逞凶的得手，使得欧美列强更把中国看成泥足巨人，急于抢在别人前面多得一块肥肉，把不可能独占的中国瓜分掉。于是，列强你争我夺地在中国划分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到1898年，中国沿海重要港湾——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悉以“租借”名义，被俄、英、德、法所强占，富饶的中华大地，则被肢解。列强在华圈定的“势力范围”，不过是迈向殖民地的中转站。而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了。“神州陆沉，国几不国”，就是中国人面对的严峻现实。